

主编 董增刚



华人在海外

——
东方使者

山西人民出版社

华 人 在 海 外

东方使者

主 编 董增刚

副主编 王冬霞

撰 稿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冬霞 王云娟

伍俊颖 苏小玉

苏克标 陈家新

吴 燕 康健兰

董增刚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人在海外. 东方使者/董增刚主编.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5.1

ISBN 7-203-05212-5

I. 华... II. 董... III. 名人-生平事迹-中国
IV. K8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1355 号

华人在海外——东方使者

主 编: 董增刚

责任编辑: 傅晓红

出 版 者: 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20 (发行中心)

0351-4922208 (综合办)

E-mail: Fzx@sxskcb.com (发行中心)

Web@sxskcb.com (信息室)

Renmshb@sxskcb.com (综合办)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新华印刷分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130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言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这似乎是一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格言。

古老的中华民族有着极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开拓精神。从《山海经》中的古老传说到汉代的张骞通西域，从唐代的唐僧取经、鉴真东渡到明代的郑和下西洋，我们的祖先不仅给后人留下了一段段浪漫的异域传奇，更给我们留下了上下求索、开拓进取和自强不息的光辉典范。

中国曾是一个贫穷的国度，数不胜数的水旱天灾和兵燹人祸迫使沿海的许多华人漂洋过海，异域谋生，近到南洋，远到非洲、拉丁美洲；中国曾是一个孱弱的民族，饱受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与盘剥，大量的华人被当作苦力，在灭绝人性的“猪仔贸易”中，被装上远洋轮船，沦落天涯，开发着广阔的美国西部。然而，华人终究是一群不屈的人。无论漂泊何处，浪迹哪里，总能在异地生根、发展，凭借自己的聪明智慧与勤劳的双手，开拓出一片自己的天地，并逐渐赢得当地人民的尊敬。

本书所讲述的“华人在海外”的故事，不是那些远古的祖先，也不是那些为生存而忙碌的海外华裔，而是近百年来有志于报国、救国的中国人，是那些到海外寻求真理、辉煌古老中华文化的仁人志士。他们是近代民族的精英，体现出伟大的民族精神。

19世纪中叶，早已强大起来的西方资本殖民势力用坚船利炮叩开中国久闭的国门，强行闯入到华裔祖地。曾经辉煌海外的中国一度久闭国门，充耳不闻世界发生的巨变，直到直面敌国的火炮和兵舰，直到一次次签订耻辱的“城下之盟”，我们才真切而痛苦地认识到“三千年之一大变局”不可避免地来到了。世界的中心已在西方，而中国已被边缘化，古老的中华民族甚至有可能被“文明”逐出这个地球、这个世界。

于是，一群群不甘于华胄断绝的中华儿女们，开始了自强不息的奋力拼争，开始了神农尝百草般的苦苦寻觅。对于来华的域外友人，他们交结、请教；对于蛮横的外国侵略者，他们抵抗、血拼。他们开始学做现代的“玄奘”，远渡重洋，到遥远的异国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开始学做当代的“郑和”，去传播、弘扬悠久的中华文明，去展示中华民族的不屈意志和抵御外侮的坚定决心。他们要中国了解世界，也要世界了解中国。

胸中何止四大洲，
神光往来鞭赤虬。
直走龙堂割龙石，
红轮不尽海西头。

魏源的这首诗表达出当时所有“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的共同心声。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记述了 30 余位名人的海外经历和事迹，配以数百张反映他们学习、工作、生活的图片。作者力图多角度、多层面地展现他们当年的风采、足迹和成就。在这些人当中，既有以身许国的革命领袖，也有立志报国的热血青年；既有外出求学的知识分子，也有落叶归根的海外华人。他们当中既有国民党人，也有共产党人，还有无党派的民主人士。他们当中有的一生成马，效命沙场，也有的一生伏案，著书立说；有的功勋卓著，光彩照人，也有的生性平和，不着波涛；有的前生挫折而后生辉煌，也有的前生进取而后生沉沦。总之，世态炎凉，任人评说。

本书力图再现百余年来中国人了解世界、走向世界的曲折进程，再现中国与世界交接的历史轨迹。它的字里行间充斥着血与火的较量，灵与肉的对撞，充斥着历史与现实的灵光。读者如果仔细品味，可以捕捉到中国从拒绝世界到走向世界的艰难跋涉的脚步，可以聆听世界从拒绝中国到接受中国的荡气回肠的壮丽乐章。

目 录

博士外交官： 伍廷芳	/ 1
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 郭嵩焘	/ 8
虎口夺食的外交家： 曾纪泽	/ 18
乱世枭雄起朝鲜： 袁世凯	/ 28
外交奇才： 顾维钧	/ 39
流亡海外、矢志革命的国父： 孙中山	/ 60
周游列国、探寻救国“神方”： 康有为	/ 74
流亡的国母： 宋庆龄	/ 85
从留学生到驻美大使： 胡适	/ 105
莫斯科的“红色教授”： 张闻天	/ 128
“红色中国”的代表： 伍修权	/ 141
为列宁守灵的中国人： 张太雷	/ 154
教育之光： 陶行知	/ 163

博士外交官： 伍廷芳



伍廷芳

伍廷芳，本名叙，字文爵，号秩庸，广东新会县黄家楼尾人，1842年7月20日出生于新加坡。伍廷芳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其父伍社常早年只身闯南洋谋求生路。伍社常精明能干，家境逐渐好转，有了一些积蓄。1845年，伍社常举家迁回广东，定居在广州市郊芳村。伍廷芳进入私塾，攻读四书五经，家人希望他通过科举考试光宗耀祖。伍廷芳少年聪颖，但对科举考试却兴致索然。无奈的父亲，只好为伍廷芳选择另一条道路，去香港求学。

求学香港

1856年，伍廷芳在亲戚陈言的陪伴下到香港，进入英国圣公会创办的圣保罗书院学习。该校为吸引华人子弟入学，特规定：凡入该校就读的华人子弟，校方免费提供寄宿、衣服及部分补贴。这也是伍廷

芳进入该校学习的重要原因。从 1856 年至 1861 年,伍廷芳在圣保罗书院接受了系统的西式教育,“治英文、算学、格致诸科”。伍廷芳学习成绩优异,得到学校教师的一致好评。到毕业时,伍廷芳已经成为一个具有西学知识的新式知识分子。毕业后,伍廷芳被选拔为香港高等审判庭译员,“成为港英政府机构中的一员”。这之后,伍廷芳一方面努力学习法律知识,为港英政府服务;另一方面,则与黄宽等人一起创办了近代由中国人主办的第一份中文报纸——《中外新报》。他们创办报纸的目的,是为了制造舆论、唤起民众:“慨国势积弱,由于民智闭塞,乃与友人创办《中外新报》于港,大声疾呼,振聋发聩。”1864 年,伍廷芳还协助陈言创办了香港第二份中文报纸——《华字日报》,“期以世界知识灌输于国人,以国内政俗告于侨胞;使民智日开,而益奋其爱国之念”。

1864 年,伍廷芳与何妙龄小姐结为夫妻。何家为香港华人社会中非常有影响的家族,其父何福堂,毕业于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的英华书院,后皈依基督教,1845 年受封为牧师,是继梁发之后的香港第二位华人牧师;其兄何卫臣,为香港第一位华人律师;其弟何启,是中国早期维新思想的代表人物,也是香港著名的华人领袖。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何妙龄小姐,受过良好的教育,她成为伍廷芳一生事业的有力支持者。与她有接触的人,无不交口称赞:“著名的伍廷芳公使夫人,在每一个人的眼中都是美丽、娴静、亲切而高贵的,她有高尚的思想和慈善的心肠。”

19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中国社会的危机进一步加深,事业的成功和家庭的幸福没有使伍廷芳忘记国家的命运。为寻求西方国家富强之源,伍廷芳决定去英国求学,求知识于世界:“以为欲救国危,非赴欧美精研法学,举吾国典章制度之不适者,改弦更张之不可。”

留学英国

1874 年,伍廷芳告别了温馨的家庭,带着对西方文明的向往,“奋发走英伦,入林肯法律学院,习法律,开游学之先河”。伍廷芳成为中国近代自费留学的第一人。林肯法律学院(练干大律院)位居英国四

大法学院之首,被视为是培养贵族的摇篮。该校校规严格,学生必须住在学院里攻读 12 个学期,且必须在法学院餐厅内进食规定次数的晚餐方能毕业。出席晚餐的全都是伦敦法律界德高望重的权威人士,他们不仅在进餐时传给新入校者以种种学识,而且介绍其在实践中积累的各种经验。出席晚餐者“皆伦敦最高地位、最有学术德望之人,每日在‘吧’中会议进餐,不仅授予新入‘吧’者以种种学识,且每餐必会谈其有用之经验”。因此,对新进入该校的学生来说,在这种场合,既可以增长学识,又可以结识伦敦上流社会的人物,对于以后的发展大有好处。

学习是艰苦的,伍廷芳以顽强的毅力坚持下来。每天,他除了完成规定的课程外,还经常到议院去旁听,实地考察英国的宪政。经过 3 年的潜心苦读,1877 年 1 月,伍廷芳从林肯法律学院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取得大律师资格,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此资格。在英国留学期间,伍廷芳学习了合同法、刑法、宪法、行政法、民事诉讼法和国际法等课程,尤以刑律、国际法最为擅长。这为他日后成为蜚声中外的外交家奠定了基础。留学英国,学习法律,也是伍廷芳人生的重要转折。

在英国,伍廷芳还拜会了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伍廷芳向郭嵩焘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并建议朝廷多派学生到海外求学。由于不懂国际法的缘故,第一任驻外公使在处理外交事务时,难免有许多窒碍之处,因此迫切需要一个懂国际公法的人的帮助。郭嵩焘迫切希望得到伍廷芳的帮助,拟聘请伍廷芳作为公使的随员。但由于伍廷芳另有他就,只好作罢。

初任驻美公使

1877 年 3 月,由于父亲病逝,伍廷芳回到了香港。因林肯法律学院的名气,伍廷芳返回香港后不久就被批准为执业大律师。5 月 18 日,港英政府司法机关经过认真审核,决定准许伍廷芳在香港法庭执行律师业务,伍廷芳因此成为第一位获准在英国殖民地担任律师的中国人。伍廷芳由此步入香港社会的上层,成为香港华人的领袖。继出任大律师之后,伍廷芳还在 1877 年至 1878 年出任香港政府考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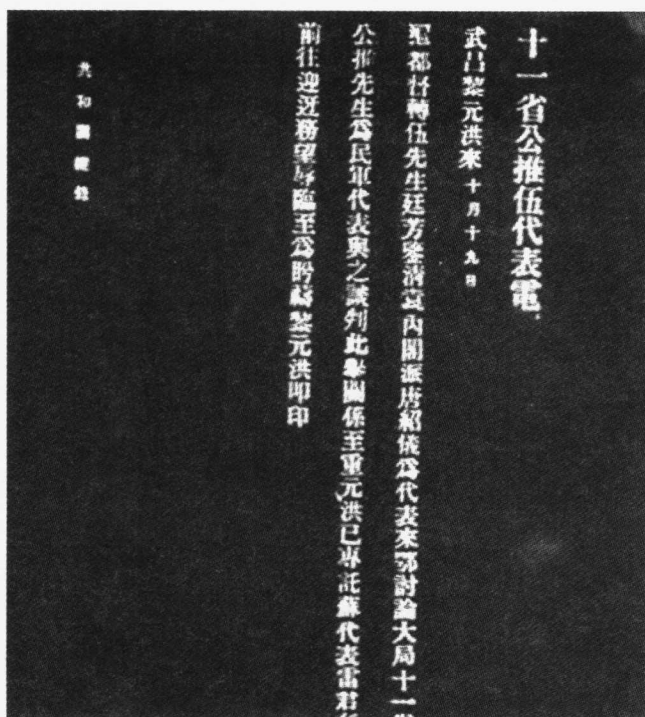
委员,参与选拔官员。1878年至1882年,伍廷芳又担任香港保良局副主席,负责社会治安、保护妇幼、组织救灾等工作。工作之余,伍廷芳还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香港的社会福利、教育、商业等事业中。杰出的才干、成功的事业,使伍廷芳赢得了香港社会的广泛赞誉,华人皆尊称其为“伍叔”。1878年12月,港督委任伍廷芳为“太平绅士”(香港治安委员会委员),成为港府委任的40名太平绅士中的唯一华人。1880年2月,伍廷芳就任港府立法局议员,开启了华人进入香港殖民政府参政、议政的先河。

在香港,伍廷芳是成功的,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香港华人地位的提高。但是,成功的背后,伍廷芳也领略了殖民者的傲慢,品尝了殖民地人民的痛苦和无奈。带着强国富民的梦想,1882年,伍廷芳离开了香港,北上天津,出任李鸿章的幕僚,襄办洋务。从1882年至1896年,伍廷芳在李鸿章的幕府生活了14年。14年中,伍廷芳一直被李鸿章“倚为左右手,凡有新建设,必咨而后行。北洋新政,如津沽铁路、北洋大学、北洋武备学堂、电报局等,皆合肥一手经始”,而伍廷芳“赞襄之力为多”。伍廷芳为中国近代化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这期间,伍廷芳还随同李鸿章参与了多次中外之间的交涉,表现出了一定的外交才能。

1896年11月,清政府派遣伍廷芳充任出使美、西、秘国大臣。至此,伍廷芳结束了长达14年的幕府生涯,步入了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1897年4月24日,伍廷芳到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并于5月1日向美国威廉·麦金莱递交了国书,正式就任清朝驻美公使。

伍廷芳首次担任驻美公使期间,其外交斗争主要集中在反对美国的排华法案。在近代初期,美国由于开发大西部的原因,曾大量吸引华工到美国,华工为美国西部的开发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随着19世纪70年代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美国社会掀起了以种族暴力为特征的排华狂潮,华工被抢劫、被屠杀的事件几乎每天都有发生。美国政府也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排华法案,如1882年的排华法案、1894年的《限禁来美华工条约》等。保护华工的利益,成为伍廷芳的头等大事。1897年,伍廷芳曾就多起排华案件向美国国务院递交

了一系列措辞强烈的照会,他多次用国际法和近代国际交往准则,批评美国政府执行的排华法案。1902 年是美国 1892 年的排华法案实施期的最后一年,美国劳工联合会迅速掀起新一轮的排华浪潮。美国众议院议员叶斯·卡恩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更为严厉的排华法案——《卡恩提案》,它涵盖了美国朝野排华分子的所有要求,其中包括对学生和商人定义的最严格的规定,还禁止中国移民前往夏威夷和菲律宾,并禁止原居这些岛屿上的华人移往美国大陆。伍廷芳立即就这一提案照会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斥责《卡恩提案》明显违背中美商约,损害了中美两国的利益,并警告美国政府,如果该提案成为法律,中国商人将不会来美国购买货物,中国学生也将不会来美国读书,中美两国关系的前景将是暗淡的。伍廷芳还在美国政界、商界穿梭活动,寻求支持。1902 年 4 月,美国参众两院在伍廷芳的抗议声中通过了《卡恩提案》。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也不顾伍廷芳的再次抗议,签署了这个法案。



南方十一省推任
伍廷芳为代表的通电



南北议和时的伍廷芳



伍廷芳遗像

“弱国无外交”，伍廷芳反对排华法案的外交努力的失败，再次说明了这一点。伍廷芳也从这件事情中体会到，只有国家的强盛，人民的觉悟，才有平等外交的可能：“如欲将苛例全行删除，则须俟国势既张，兵威稍足，元气内固，自然外侮不生。”在给海约翰的照会中，伍廷芳警告说：如果美国继续禁止某些获得特许的华人进入美国，那么，中国政府也将采取相应的行动，禁止所有传教士、银行家、路矿工程师、铁路承包建造商、商业经纪人和无固定住处的商人进入中国。伍廷芳的警告在3年后变成了现实，1905年，中国人民掀起了广泛的抵制美货运动，美国也品尝到了被报复的滋味。

再次出使美国

1902年12月，伍廷芳完成了首次担任驻美公使的使命，返回中国。回国后，伍廷芳先后担任修订法律大臣、鸿胪寺卿、外务部右丞、商部左侍郎、外务部左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职务，其主要贡献是与沈孝本一起主持了修律工作。伍廷芳主持完成的新增法律主要有：《大

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商律》、《大清印刷物件专律》等。伍廷芳按照西方近代法学原理,对中国旧有的法律进行了全面的删改与增设,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近代法律体系。

1907年9月,伍廷芳被再次任命为出使美、墨、秘、古国大臣。1908年2月28日,伍廷芳到达旧金山,3月7日,抵达华盛顿,沿途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3月11日,伍廷芳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国书,正式成为清朝第八任驻美公使。在美国,伍廷芳完成了《中美公断专约》的签字换约活动;另外,伍廷芳还与美国各界广泛交往,以加深美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

远赴南美大陆,出访巴拿马、秘鲁、墨西哥、古巴,是伍廷芳再次担任驻美公使时最重要的一次外事活动。1909年5月,伍廷芳开始了南美之行,6月8日,抵达巴拿马,会见了巴拿马总统,初步达成了中巴建交、设立领事的协议。6月24日,伍廷芳到达秘鲁首都利马城。经过谈判,8月25日,伍廷芳与秘鲁外长签订了《中秘条约》,基本上达到了维护国权、保护华侨的目的。10月至11月间,伍廷芳前往墨西哥、古巴递交国书,完成任务后返回美国。1910年3月,伍廷芳结束了驻美公使的使命,绕行欧洲回国,6月进京销差。8月因病辞官,寓居上海。

辛亥革命后,伍廷芳先后担任过沪军都督府外交总长、南北和谈南方首席代表、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等职务。1916年,出任中华民国外交总长;1917年曾代理国务总理;护法运动时,曾担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外交总长,1920年与孙中山一起在广州重组护法军政府。1922年3月23日在广州病逝,享年80岁。伍廷芳为维护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一个近代法治的国家贡献了自己的余生。

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 郭嵩焘



郭嵩焘

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枪炮打开中国大门之前，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就是所谓天朝上国的世界观。鸦片战争以后，天朝上国的大门被打开，但中国人“夷夏之防”、“用夏变夷”思想观念的转变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驻外使臣首先接受了西方先进的文明，认识到西方也同我们一样具有文明教化。郭嵩焘就是他们的代表。

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晚年自号玉池老人，1818年出生于湖南湘阴县城。郭家是湘阴有名的富室，主要经营商业。郭嵩焘从小就有志于学，17岁考取秀才，19岁中举，29岁成进士、点翰林。1836年，郭嵩焘就读长沙岳麓书院时，与刘蓉、曾国藩换帖订交，后又结识了左宗棠、江忠源、罗泽南等人，这些人均是注重“经世致用之学”、立志要建功立业的人物，在当时全国读书人沉醉于宋明理学的时候，这群人注重现实政治的研究和实践，并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成为

挽救清朝统治的“中兴名臣”。郭嵩焘虽与他们相交甚深,但志向却与他们略有不同。郭嵩焘思想活跃,比较自负,好胜心强;不满现实,好批评,比较傲慢。这种性格决定了郭嵩焘在官场中很难左右逢源,但在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时却可以成为时代变革的代言人。

初识洋务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郭嵩焘开始思考“洋患”这个中国近代史的大问题。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郭嵩焘在浙江学政罗文俊幕中“亲见海防之失,相与愤然言战守机宜”,他曾自称:“年二十二,即办洋务。”本着以史为鉴的目的,鸦片战争之后,郭嵩焘“读书观史”,悉心考察历代边患的缘由,辨正其得失。1852年,太平军进入湖南境内,因双亲去世而丁忧在家的郭嵩焘和左宗棠避难于玉池山。太平军围攻长沙时,湖南巡抚张亮基延请左宗棠出山相助,在郭嵩焘的劝说下,左宗棠进入张亮基的幕府,成功地阻止了太平军进入长沙。1853年初,咸丰皇帝命令大江南北各省在籍官绅举办地方团练,帮助清朝军队镇压太平军,曾国藩在郭嵩焘的劝说下,出办湘军。郭嵩焘还劝说曾国藩劝捐筹饷,并亲赴益阳、宁乡等处,募得十余万金,解决了湘军的粮饷问题。郭嵩焘还劝说湖南巡抚骆秉章开厘捐筹军饷,与罗泽南、江忠源等练水师,保交通,积极为湘军的创立出谋划策。1856年,郭嵩焘奉曾国藩之命,到浙江为湘军筹饷。1858年,郭嵩焘入京供职翰林院。1859年,随僧格林沁办理天津海防,因用人失误被僧格林沁弹劾,受到降三级处分,再值南书房。1860年,辞职回家。1862年,经江苏巡抚李鸿章的保举,郭嵩焘出任苏淞粮储道。1863年,郭嵩焘被擢升为两淮盐运使,很快又受命署理广东巡抚,但不久就被左宗棠纠参丢官。1866年,郭嵩焘辞职返故里,一直到187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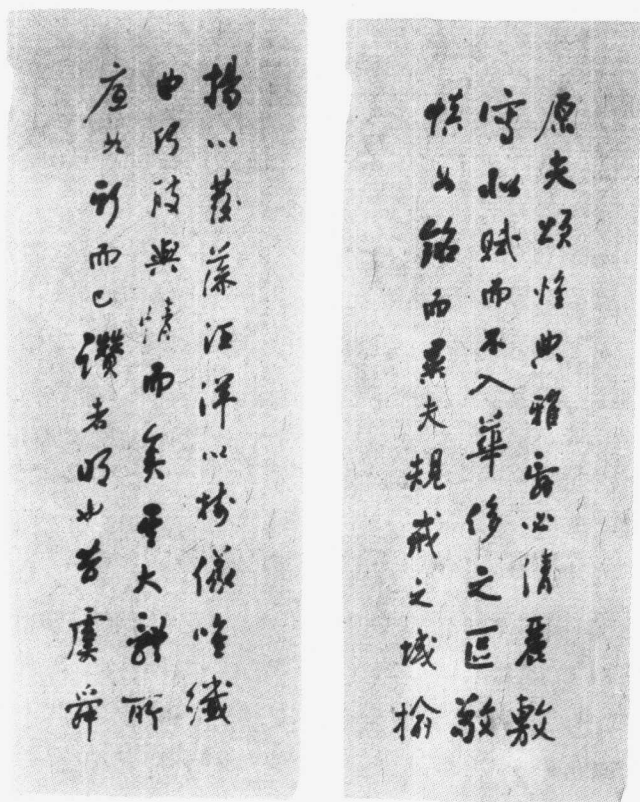
这一期间,郭嵩焘对“洋务”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1856年,他在上海拜访了英、法等国的领事,参观了“利名”、“泰兴”等洋行和火轮船,访问了“墨海书馆”,会见了西方传教士艾约瑟和伟烈亚力以及在墨海书馆工作的中国人王韬和李善兰。在墨海书馆,郭嵩焘见到机器印刷,对西方机器的巧妙深为赞许。1862年,郭嵩焘在上海、广东

对西学有了新的认识,他认识到洋人“兵精而器利”,并对此深感担心;也认识到西人电报“直夺天地造化之巧”,“足以称雄中国”。随着对西洋认识的增加,郭嵩焘对当时朝廷内外不悉夷情、“无一人通知夷情”深表忧虑:“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这样一种状况,如何能够正确地处理夷务?郭嵩焘对魏源在《海国图志》里说的一段话“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极为赞赏,誉为“至论”。这也可视为郭嵩焘通过各种途径探索、了解夷情的原因。

1875年,由于文祥的推荐,郭嵩焘受命为福建按察使。这时,清政府正在讨论海防问题,郭嵩焘上《条议海防事宜》一折,详细阐述了自己关于洋务的一些意见。郭嵩焘认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也就是说,办洋务,首先必须了解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的原因,探讨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的根本。换句话说,中国要想改变落后的局面,就必须学习西方富强的根本,首先要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其次才是军事,“中国与洋人交涉,当先究知其国政军政之得失、商情之利弊,而后可以师其用兵制器之方,以求积渐之功”。郭嵩焘批判洋务派不探讨西方富强之根本,只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是舍本逐末,不可能使中国走向富强,“舍富强之本图,而怀欲速之心以急责之海上,将谓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从中可以看出,郭嵩焘对“洋务”或“西学”的认识,已经超出了洋务派的水平。在近代思想家之中,郭嵩焘也是较早提出要学习西方政教用人制度的人。

出使英国

1875年,英国驻华使馆翻译官马嘉理在云南被杀,引起中英之间的外交冲突,清政府被迫派大员赴英“通好谢罪”。7月,郭嵩焘受命为出使英国大臣;随后,清政府任命郭嵩焘署兵部侍郎,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1876年10月,郭嵩焘由上海启程赴英,12月抵达伦



郭嵩焘手迹

敦,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

郭嵩焘虽然有“知洋务”的名声,但却为正统士大夫所不齿,现在郭嵩焘又要远离父母之邦去跟“洋鬼子”打交道,向英国道歉,这就更为一般士大夫视为辱国。当时京城流行一句辱骂郭嵩焘的联语: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在郭嵩焘的家乡湖南,许多人都以有这样的同乡为可耻,湖南乡试考生竟在玉泉山集会,商议捣毁郭嵩焘的住所。在京友人也多劝他辞谢使命。但为了“通察洋情”、探究西洋政教的真谛,同时为了“求有